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74

金圣叹·毛宗岗·
张竹坡

王汝梅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6
74





王汝梅 1935年生，山东兖州市人。汉族。195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0年，入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培训班进修一年。现任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金瓶梅》研究室主任。曾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兼任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吉林省英才奖章。编撰出版学术著作《金瓶梅探索》、《中国小说理论史》等十种，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整理校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会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合作)，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分别由齐鲁书社、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引 言/1

一、金圣叹与《水浒传》评点/2

(一)金圣叹的生平及其对《水浒传》的批
评/2

(二)金圣叹的“小说本体认识”/6

(三)金圣叹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理
论”/15

(四)金圣叹的“小说结构技法”/19

(五)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评价/28

(六)金批《西厢记》/33

二、毛宗岗与《三国演义》评点/38

(一)毛评的思想倾向问题/38

(二)毛宗岗论小说的实录与虚构及人物
形象塑造/43

(三)毛宗岗论小说的结构、技法/49

- 三、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56
- (一)张竹坡生平思想/56
 - (二)张竹坡与第一奇书/60
 - (三)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65
 - (四)“张评本”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75
 - (五)张竹坡的《金瓶梅读法》/77
- 后 记/92

引 言

中国古代社会走到清代,已进入封建社会末世。传统文化学术在这一历史时期进入综合阶段,呈现出总结与集大成特点。清初,在思想史上有三大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小说评论方面,则以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最为突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在康熙年间,比前二家都稍晚),其成就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高峰。其评点方式,其理论成就,值得我们今天加以了解、继承与借鉴。这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金圣叹与《水浒传》评点

(一)金圣叹的生平及其对《水浒传》的批评

金圣叹(1608—1661),原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为人瑞,号圣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吴县)人。二十岁前后,曾考中秀才,后因在岁试时文章被学使认为怪诞不经,革去秀才。次年改名应试,再得秀才,于此显露才气,而不屑仕进。三十岁以后开始批书,他将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和王实甫称为“六大才子”,将他们的著作称为“六才子书”,决心以毕生的精力研读之、批评之。崇祯十四年,金圣叹完成了《水浒传》的评点工作,以《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名目刊行。

明亡后,金圣叹“绝意仕进”,“终日兀坐,以读书著述为务”,先后研究佛学、易学,并继续其评点。五十岁时,刊刻了《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是金圣叹文学批评的重要著述之一,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顺治十八年,苏州秀才借顺治帝驾崩之机,哭于文庙,以抗议知县酷虐

害民，响应者千余人。巡抚朱国治指其谋反，逮捕了数十人，金圣叹是其中之一。这是清初著名的“哭庙案”，金圣叹被判斩刑，家产籍没，七月被杀于南京。其时，他的《第四才子书杜诗解》尚未完成，最终带着“庄、骚、马、杜待何如”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金圣叹思想驳杂，其著述涉及小说、戏曲、儒学、佛学等许多方面。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称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而其作文时又有疏狂之气，好作惊世骇俗之笔，这样就使他的思想观点呈现出许多矛盾，甚至抵牾之处。金圣叹的理论著述还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等，其中关于哲学问题、社会政治问题都有一些精彩的论述。

金圣叹所刊刻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体现着其小说理论观点。包括三篇序言，托名施耐庵所作的一篇序，《宋史纲》、《宋史目》批语，《读第五才子书法》以及正文部分每回的回前总评、夹批与眉批。而此书的正文部分也经过了金圣叹的删改。他以百回本为底本，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删去第七十二回以后的部分，终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并加写卢俊义惊噩梦作为结尾。对于前七十一回的文字也作了润饰，伪托为“古本”刊行于世。这部书问世后，广为流传，逐渐淘汰了其他各种版本，“三百年中，七十回本居然成为《水浒传》的定

本”(胡适《水浒传考证》),而金圣叹的评语也和这个本子一起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柳南随笔》)。

金圣叹所评点和删改的《水浒传》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就是他一方面将《水浒传》视为“六才子书”之一加以精心批改,而且对其中的英雄人物亦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却对书中起义军的造反行为不断咒骂,认为他们“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扑剜削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并删去了招安的情节而加上卢俊义惊噩梦的结尾。这一十分明显的矛盾使后世的研究者对之褒贬悬殊,莫衷一是。从其全部的评点文字来看,我们认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此书艺术上的喜爱与钦仰,其矛盾之处则反映了他内心中深刻的冲突:既有作为下层知识分子面对社会黑暗与混乱而感到的愤慨、不满,也有其头脑中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的束缚,更有着当时农民起义势如破竹,威胁明王朝,使朝野舆论反对招安对他造成的压力。在这样巨大的矛盾冲突之下,他便腰斩原书,去掉招安,提出“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序三)。对《水浒传》进行了全面的艺术鉴赏与理论分析,而以封建正统的思想大力批判其“形迹”。金圣叹希望以这种在他看来并不自相矛盾的方式回避其内心的矛盾,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一定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认识,对其小



《水浒传》插图“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说理论的探讨也着重于他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贡献。

(二) 金圣叹的“小说本体认识”

第一, 因缘生法, 忠恕格物。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 有一条纲领性的观点: “施耐庵作《水浒》一传, 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 是深达因缘也。”(五十五回回评) 既然是其理论之“总持”, 我们就要对这一概念加以分析领会。所谓“因缘”是佛学的基本概念, 古印度佛陀提出十二因缘说, 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存在都是依赖于某种条件(即“缘”)的, 所谓“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其后佛学思想发展中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流派, 但缘起说始终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金圣叹并非虔诚的佛教徒, 但他对佛理兴趣很浓, 在《水浒传·序三》中自称十一岁即读《妙法莲华经》而爱不释手。在他的著述中也多次涉及《法华》、《金刚》、《楞伽》等佛典。《法华经》是我国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空宗的观点对金圣叹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大乘佛学的空宗将最高真理称为不可用言语或概念描述、认识的, 故谓之“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认识甚至佛陀、涅槃等都是—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 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 而其本身并无独立的实体或自性, 其偈: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第五回夹批中，有这样两段话：“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必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这里，金圣叹以佛理解文，以因缘生法、一切皆空的假有思想来揭示小说的虚构性特征。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是虚空，都是心造的幻影，那么小说之中的景物、人物也都是作者心中的影像写在纸上而形成的。小说中的世界是一个作者虚构的世界。

金圣叹的这种解释使小说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基础而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这无疑是有缺陷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合理的内核。小说作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作品，是通过文字艺术地模仿生活。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并非是现实中的时间和空间。现实生活只有经过作家的心灵感受、提炼以及文学创作过程才可能转化为小说中的世界，它蕴含着作家的主体精神。所以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这“独特的世界”就是虚构的世界。从这个角度上，我们

说,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特性之一。所以在“因缘生法”的佛理和虚构性的文理之间是存在着契合点的。金圣叹正是抓住了这一契合点从而形成了他对小说虚构性的本体认识。

在序三中,金圣叹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论者一般将这段表述解释为建立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小说创作思想,认为金圣叹强调了观察、推究客观事物,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创作理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格物”一词是儒学的传统概念,语出《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它的涵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很复杂的,单在距金圣叹时间较近的文化背景中的宋明儒学里就对之有不同的解释。

朱熹在《四书章句》中将“格物”一词释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而在工夫论上,朱氏继承了程颐的观点,强调:“或曰:‘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通?’曰:‘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之处。’”可见,在朱熹那里,格物是一个通过不断地考究外在事物,逐渐积累而终至把握义理的过程。而在格物中探求事物规律的认识意义只是穷理的途径与手段,其终极目的在于“理”。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而陆王心学

则将朱熹的以太极为至理的天本体论返归自身，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王阳明提出格物不应外求，而应反求诸心：“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所之便是物”。

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不计程朱理学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一种唯心的道德完善，那么倒是可以据此承认金圣叹的“格物”论是强调了小说家观察外物、重视生活实践的方面，即“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第一回回评）。但是，一方面，朱熹对事物的认识是“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言语，无不是事”，也即不仅客观的物质实体，人类的活动为“事”，以至思维念虑都属于“事”。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金圣叹在第五十五回评“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之后有这样的话：“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才子？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可见金圣叹的格物观应是建立在“因缘生法”这一世界“假有”思想基础上的。这与人们通常所阐释的唯物观点则有矛盾之处。而在明末虽陆王心学已度过了其鼎盛时期，但心学理论对客体的认识方式因其与禅学的相通之处而对于深谙佛理的金圣叹应该是不无影响的，所以“格物”应是作者对于因缘生法的创作之理的内心表现感知过程。它侧重于主体内心的感悟，所谓“澄怀格物”

就是涤除杂念，保持内心的空明状态，以体会因缘之理。

在序三中，金圣叹亦提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以忠恕之道来具体解释格物的过程。在传统儒学的意义上，忠是指尽心为人，恕是推己及人。而金圣叹说：“夫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四十二回回评）既然世界是因缘生法的假有，那么因与缘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事事物物以至于人自身的精神思考则是与创造主体内心可以置换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世事万物理解为主体内心的创造或其映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现象而已，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知道了“忠”，所以“忠不必学而至于忠”，而将这一“原理”推己及人，明白“家国、天下之人”无有不忠者，则为“恕”，忠恕的过程就是格物的过程。忠恕既明，也就达到了从格物到物格的飞跃，则能够以己心烛照万物，依因缘之理进行文学创作。从这番复杂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看到格物忠恕与因缘生法是血脉相承、联系密切的，它所强调的是主体内心体悟的作用。

应该说,虚构性与主体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从小说与世界的关系看,它是虚构的,而从小说与作者的角度说,其虚构性的特征则要求着主体的创造能力。所以说,忠恕格物与因缘生法思想共同形成了金圣叹对小说主观虚构性质的认识基础。

当然,在小说创作中,由于其虚构性特点,主体的创造作用的确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能意味着完全抹煞客观生活的因素。因为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根本上是源于生活、源于我们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就《水浒传》这部书来说,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民间更有着武松、李逵、鲁智深的故事流传,足见其有生活原型的存在。但施耐庵所写的既非历史上的宋江及其起义队伍事迹的摹写,更不是可以考证出的某支起义军的史实记载,它是一个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聚义水泊梁山的艺术虚构世界,这其中不仅包含有作者精心铺排描写,刻意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也还有着原有历史及故事的素材内容,单纯只强调其虚构性是不全面的。只是我们无法强求古人有先进的思想觉悟,所以应该分析其合理内核与理论缺陷,给以应有的评价。

第二,事为文料。

在《水浒传》评点中,虽然时有将小说与经书、史传类比相提的说法,但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

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明确地以“因文生事”的虚构性特征将历史与小说截然区分。在小说的创作中，并不需要依循实录史实的原则，而只需要按照文学成规与审美规律的要求对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处理，其增删补减完全可以由作者依据主观审美感受来决定。所以，“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二十八回回评）。进而，金圣叹提出“事为文料”的说法，阐释了事与文的关系，突出了小说的艺术审美性，将其对小说本体的认识进一步完善为审美虚构理论。

所谓“事为文料”，就是在二十八回总评中，金圣叹指出“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既然连被金圣叹视为“才子书”之一的史传作品都能够“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则“岂有稗官之家……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金圣叹又以此篇“武松醉打蒋门神”为例具体说明：“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二十八回回评）在这里，施恩领武松去打蒋门神，路上吃了三十五六碗酒是基本素材，而作者将这一简明的情节加以敷衍铺排。

不仅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更详细描写了武松在这一过程中的诸般语言、动作，凸现了武松豪爽勇武、心高气傲的个性，也使人物形象愈加栩栩如生，文章更为花团锦簇，迥异于“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的官史之作。

可见，在这里，“事”是指历史或现实中已发生或本来存在的故事素材，而经过作家创造性思维与艺术地经营加工之后得到的具有审美效果的文章才是我们看到的小说。“文”则是这一创造过程中主体艺术构思与文学叙事刻画的总和，其目的是为了表现作品的审美特质。在第八回回评中，金圣叹以“文章为物也，岂不异哉”的大段文字论述了文章之美，他描述了自然万物的优美与丑陋，说那终究是造化安排，而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如云霞般灿烂，如山川般竞秀，如花朵般锦簇，如犖尾般彩耀，能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小说审美特性的重视，而这种美学特征的实现，金圣叹又是从其因缘生法的世界“假有”观出发，将之理解为是才子文心的艺术表现。在第五回夹批中有这样一段话：“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见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小说和世界一样是因缘生法的假有，那么它便纯然成为作者心灵的产物，主体心灵成为文学创作的直